

“十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A History of China

Translation in

中国翻译通史

马祖毅 等著

现当代
部分


C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教育出版社

第三卷



目 录

自然科学著作的翻译篇

第1章 科学名著的翻译时代	3
第2章 系统科学进化论的翻译	8
第3章 相对论的翻译	26
第4章 西方近现代科学名著的翻译	52
第5章 科学翻译大潮中的科普翻译	92
第6章 其他科学文献的翻译	117
第7章 科学术语译名的统一	130
第8章 科学翻译出版机构——文化传播的媒介	161
第9章 文化传播的使者——科学翻译家	170
第10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科学翻译	207
第11章 荒芜年代的科学翻译	226
第12章 新时期的科学翻译高潮	241
第13章 计算机技术书籍的翻译出版	296
第14章 新时期的科普翻译	342
第15章 科学丛书的翻译出版	413
第16章 新时期科学翻译高潮中的科学译名统一	455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in China

自然科学著作的翻译篇



第 1 章

科学名著的翻译时代

在经历了 20 世纪最初十几年的社会纷乱之后,中国历史进入一个相对平稳的发展时期。即便是在此前不稳定的社会语境中,国人中的精英们还是为科学文化在国内的传播付出了艰辛而又卓著的努力。兴办新式学校,倡导以科学知识的传授为基础的现代科学教育,翻译科学教科书,这一切都为科学著作翻译新时期的来临做出了积极的知识上和思想上的准备。随着新文化运动的骤雨疾风开始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洗礼,以及中国科学社的诞生和《科学》杂志的问世,20 世纪中国的科学翻译也与时俱进,迈入一个崭新的时期,即以科学名著的翻译出版为其显著特征的科学名著翻译时代。

一、“科学”大纛的高擎与白话文运动

众所周知,辛亥革命虽然终结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体制,但是这场革命并不彻底,既没有也不可能涤荡传统的专制思想,也远未使中国文化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一时间,鬼神迷信流行,许多地方公开设坛扶乩,《灵学》杂志也在上海出版,宣扬“鬼神之说不张,国家之命遂蹙”之论。在文学方面,也是“文以载道”、“代圣贤立言”等陈旧的观念盛行于世。有学者认为,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在人文与科学问题上造成文化运动。因此,一场如狂飙一般、声势浩荡的新文化运动应时代的需要而掀起。1915 年 9 月,《青年》杂志创刊,鲜明地高擎科学与民主的大旗,对愚昧和专制展开凌厉的攻势,从而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帷幕。

新文化运动弘扬的时代主题之一就是“科学”。在《新青年》杂志的创刊号上,陈独秀以《敬告青年》一文明确指出:“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他认为,“科学”对社会的影响不亚于“人权说”,两者于社会之功即如“舟车之有两轮”,近代欧洲的发达正是由于科学之大兴。而时人之所以愚昧无知,信鬼奉神,是因为不遵从科学的法则。因此,要摆脱蒙昧,斩除迷信,根治一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in China
中国翻译通史
现代部分·第三卷

切“符瑞五行之说”、“惑世诬民”之论、求魂乞灵之风，惟有仰仗科学，“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因为“科学说明真理，事事求诸证实”。士农工商医各行若要求得，也惟有借重于科学。陈独秀在文章的最后以激越之辞向青年发出呼吁：“宇宙间之事理无穷，科学领土内之膏腴待辟者，正自广阔。青年勉乎哉。”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他再一次颂赞那光焰万丈的“赛先生”。并且指出：“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新文化运动时期，大力颂扬科学的还有为数众多的先进人士。鲁迅曾说：“科学者，神圣之光，照世界也，可以遏末流而生感动。”（《鲁迅全集》[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35）胡适更认为，科学是“再造文明”的利器。

新文化运动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反映在语言方面就是废弃文言文，使用白话文。早在19、20世纪之交，白话文运动就渐趋展开。但是，当时推行白话文的主张还仅限于小学，而且倡导白话文的人们本身还在采用文言，因此，其声势还十分微弱。1918年5月，鲁迅的小说在《新青年》上发表之后，白话文的文学作品和翻译作品犹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蔡元培后来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总序》中说过：“民元前十年左右，白话文也颇流行……但那时候作白话文的缘故，是专为通俗易解，可以普及常识，并非取文言而代之。主张以白话代文言，而高揭文学革命的旗帜，这是从《新青年》时代开始的。”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白话文更是以席卷之势蔓延到整个文化领域。民国教育部于1920年1月正式通令全国：“自本年秋季起，凡国民学校一、二年级，先改国文为语体文，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王建军：《中国近代教科书发展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251、253）教育部于同年4月又规定，至1922年止一律废止文言文教科书，采用语体文。在谈到文言与白话的区别时，蔡元培说：“白话是用今人的话，来传达今人的意思，是直接的。文言是用古人的话，来传达今人的意思，是间接的。间接的传达，写的人与读的人，都要费一番翻译的工夫，这是何苦来？”（蔡元培：《国文之将来》，1919年《新教育》第2卷第2期）白话取代文言是一场深刻的语言革命，它不仅使汉语语言言文一致，而且建构了全新的文体。白话既适合于对科学知识的表述，其自身的变革也改变了含混模糊的思维方式。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新文化运动又称为白话运动。

随着这场涤荡中国传统文化中陈腐观念的新文化运动的深入，科学精神和民主观念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张扬，以科学文化为主导的西方近代文化在国内得到更加广泛的传播。同时，新文化运动也为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创造了一种更为良好的文化氛围。

二、中国科学社与《科学》

正是《新青年》发起新文化运动的同年，一批专习科学的留美人士发起创立了中

国科学社,成为中国科学文化发展史上的一大盛事。

20 世纪初,国人留学多涌入日本。1908 年,美国为加强对华影响而将庚子赔款中的部分“退还”,作为中国派遣留学生赴美入各大学深造之专款。从 1909 年 7 月第一批庚款留美生成行,至 1925 年,共遣送了 1031 名学生进入美国各大学深造。详见下表:(林子勋:中国留学教育史(1847—1975),台北:华冈出版有限公司,1976:273—274)

1909	1910	1911	1912	1913	1914	1915	1916	1917	1918	1919	1920	1921	1922	1923	1924	1925
47	70	62	16	43	44	41	52	42	82	71	79	96	63	91	63	70

这些留学生主要习学理、工、医、农、商、建筑等各科,文科名额较少。而且,留学生的确定都经过严格的遴选,因此留学前就有较高的知识程度,抵美后也能专心求学,获得高学位者人数颇多。据调查,1902—1911 年,中国留美学生获博士学位者 6 名,硕士学位者 16 名。又据另一调查,仅在哥伦比亚大学留学的中国学生中,1911 年即有 3 名获博士学位,6 名获硕士学位,3 名获学士学位。当时的留学生组织了许多科技团体,中国科学社即是其中影响最为久远的著名科学社团。

1914 年 6 月,当时留学美国哈佛和康乃尔大学的赵元任、周仁、胡明复、秉志、章元善、过探先、金邦正、杨杏佛、任鸿隽、胡适之等人发起创办科学社(Science Society)。1915 年 10 月,“中国科学社”正式成立,并发行社刊《科学》月刊。中国科学社以“联系同志,研究学术,以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为宗旨,社员主要是攻读自然科学的留学生。1918 年,该社由美国迁回国内。1932 年,会员达 1400 余名。科学社在 1915 年 10 月通过的社章中拟订了 9 条,1923 年又略加修改。其中关涉科学翻译有“译著科学书籍”、“编订各学科的科学名词”。除《科学》杂志外,科学社为普及科学又于 1933 年创办《科学画报》,另有年会论文汇编《论文专刊》9 卷,刊行学术专著《科学丛书》,以及翻译著作《科学译丛》。

辛亥前后,中国也出现过一些科学组织,如 1907 年在巴黎组织的中国化学会欧洲支会、1909 年张相文等人创立的中国地学会、1910 年创设的中西医学研究会、1912 年成立的三个学会(广东中华工程师会、上海中华工学会、路工同人共济会)于 1913 年合并成中华工程师学会、1913 年成立的地质研究所等,但这些科学组织大多机构松散,也没有常规性地开展活动,且多不持久。中国科学社的创立则标志着这种局面的结束。科学社有严密的组织结构,制定了科学社章程和详细的工作计划,出版多种刊物,设立了图书馆,定期召开年会。因此,科学社建立之后,中国的科学活动才真正步入正规。科学家杨铨在 1917 年在中国科学社的第二次年会上形象地说道:“吾科学社今日之常年会,他日中国全国科学大会之原生动物耳。”

自中国科学社成立之后,又有大批的科学组织相继建立,如中华医学会(1915)、中华农学会(1917)、中国地质学会(1922)、中国气象学会(1924)、中国生理学会(1926),以及中国古生物学会、中国纺织学会、中国化学会、中国物理学会、动物学会、植物学会、土壤学会、林学会、化学工程学会、矿冶工程学会、水利工程学会、电机工程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in China 中国翻译通史 现当代部分·第三卷

师学会、机械工程学会、土木工程学会、中华自然科学社,等等。这些学会都有各自的办事机构和相应的学术刊物,都进行过多次的年会和其他学术活动。因此,中国科学社的建立和发展,对于中国近现代科学的发展和繁盛,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其筚路蓝缕之功应永志史册。这些学会组织的建立,既为科学文化的发展与传播进行了组织上的准备,为科学翻译集中了大批的翻译人才,也为科学译书的出版刊行创造了机会。

三、倡扬科学名著的翻译

科学名著在中国的翻译介绍,最早可以追溯到明末徐光启与利玛窦合作翻译的《几何原本》前6卷。在近两个半世纪之后,由李善兰与传教士伟烈亚力联袂,补译完后9卷。20世纪初,为了在新式学校普及科学教育,大量的科学教科书得到翻译。显然,这些科学译书仅是为教学而翻译的,绝大多数都是中等水平,不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至新文化运动以后,为矫正科学翻译中的这种不足,许多有识之士倡导翻译科学名著,以促进科学在中国的发展。

较早力倡翻译名著的是新文化运动的志士之一的胡适。他于1918年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提出,为了创造新文学,必须“赶紧多多的翻译西洋的文学名著做我们的模范”,并且“只译名家著作,不译第二流以下的著作”。郭沫若也呼吁“国内各大书坊多采办海外的名著”。(邹振环:《西书中译史的名著时代在上海形成的原因及其文化意义》,《复旦学报》,1992[3]:87—93)这些言论虽然是针对文学翻译而言的,但无疑同样适用于科学著作的翻译活动,也必定对当时的科学翻译的原著选择产生过一定的促发作用,因为两篇文章都分别刊登于当时颇有影响的杂志上。前者登载于1918年4月的《新青年》上,后者则刊登在1923年的《创造季刊》第1卷上。

至1925年,为扩充设立于北京的国立编译馆,龚张斧曾上书时任北京政府教育部长的章士钊。文中“扩充编译事业”一条提出要翻译欧美科学名著。著者认为,当时的中国出版业衰败,“名篇巨制,罕有移译”,“我国学术界贫病情形,已成垂死之象,非亟起治疗不可。故凡欧美日本旧有或新出之自然科学、哲学、政治、经济、社会、文艺诸名著,宜尽量移译。”(原载《甲寅》周刊第1卷第15号。转引自李亚舒、黎难秋主编《中国科学翻译史》,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328—329)

1932年国立编译馆成立之后,民国政府在对其规定的组织条例中也有涉及翻译名著的要求。在编译图书一项包括:“关于阐明文化及高深学术者”、“关于世界专门学者所公认具有学术上之权威者”、“关于内容渊博、卷帙浩繁非私人短时间内所能完成者”(《国立编译馆组织条例》,民国22年4月22日公布,转引自李亚舒、黎难秋主编《中国科学翻译史》,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332)。这三项编译图书的要求事实上都是要翻译世界名著,当然也包括科学类著作。在1939年教育部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上,继任馆长陈可忠提请政府扩充国立编译馆。他在提案中说道:“查编译事业,关系国家教育文化,至为深巨。……二十一年六月,教育部乃创设国立编译馆,使负教科图书编审之责。惟成立之初,适当国难之际,财力人力,两感不敷。年来虽

(龟)勉从事,粗具规模,但占应行实施之编译计划,距离尚远。兹中央既深念编译事业之急切,于各级教育实施方案内有‘扩充国立编译馆,整理我国固有名著,翻译各国代表作品,并从事编译各级学校教科书及教师用之参考书籍’一项。并经提出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议决通过。现抗战救国,同时并进,举凡科学国防知识,专门著作及各级学校教本与读物之编译,不容再缓。应由政府筹措专款,实行扩充国立编译馆,积极推行编译事业,以应急需。”(《教育部提高高等教育改进案》附件,转引自李亚舒、黎难秋主编《中国科学翻译史》,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333)这段话提及曾有“各级教育实施方案”,其中要求扩充国立编译馆,并翻译各国名著,而且这一方案得到了官方的通过。十几年之后,陈氏则在提案中再次重申翻译外国名著的主张,其目的就是应发展教育文化之急需。

社会各界人士的大力提倡,加之诸多其他社会因素的促动,科学翻译至20世纪20年代迎来了它的灿烂的黄金时代。马君武翻译的进化论名著《物种原始》192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揭开了科学名著翻译的序幕。此后,西方近现代自然科学中各学科的重要著作得以翻译出版,更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世界名著”的问世使这一科学名著翻译活动达到高潮。



第 2 章

系统科学进化论的翻译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始,以及“科学”大旗的高擎,科学进化论的翻译也进入一个崭新的时期。此期进化论的译介与早期和 20 世纪初的翻译大不相同。早期的翻译只是在一些报刊或译书中零星地涉及进化论这一主题;20 世纪初虽译出一些进化论方面的书籍,但代表科学进化论的主要著作并未得到翻译,而达尔文的科学进化论著作也仅有部分章节的翻译出版,既不完整也不系统。直至马君武译书出版之后,科学进化论才通过翻译系统地传入国内,成为 20 世纪 20、30 年代科学名著翻译大潮中最有影响的科学翻译活动之一。其中既有达尔文科学进化论著作的翻译,也有其他进化论名著的翻译出版。此类著作得以翻译的数量之大,出版次数之多,盛极一时。

一、达尔文著作的完整翻译

科学进化论于 20 世纪初就有一些著作被翻译成汉语,而马君武对达尔文《物种起源》一书的翻译则标志着科学意义上的进化论开始传入中国。不过,马氏的翻译活动由于多种原由而不得不终止。在他从德国返回之后,才重续旧译,且因原译章节中错误之处太多,遂将以前翻译的部分章节重新翻译,并阐述了翻译的目的。译书序言首先盛赞达尔文“以天择说解释物种原始,为十九世纪最大发明之一,其在科学界之价值,与哥白尼之行星绕日说、及牛敦之吸力说相等”。然后,译者就全书的翻译过程记述道:“至 1916 年归国居北京,颇欲续译之,成数页而止。直至 1918 年,服役于广东无烟火药工厂,所新制火药既成功,颇多闲暇,乃续译第六章至第十五章,凡七月余而毕。复检视第一卷旧译,则错误太多,惭愧几无以自容。盖是为予二十二岁时所为,于博物学既无所得,英文亦多误解。旧译既不可复用,乃将前五章重译之,又历三月余乃脱稿。重译此书,几费予一年之精力。所以不惮烦以为此者,盖以补予少年时之过。且此书为全世界文明国所尽翻译,吾国今既不能不为文明国,为国家体面之故,亦不可无此书译本。予固知自民国成立以来,国人堕落不复读书,然国人终有悔过读书之一

日。此等重要书类,诚有四五十种流行国内,国民之思想,或起大变化软。”作为一名科学家,马君武对科学翻译的严谨态度由此可见一斑,从事翻译也有着明确的目的,既为开启“文明”,也为“体面之故”,更为国人在“堕落”之后的“读书之一日”做出积极的准备。1920年,他翻译的《物种原始》由中华书局作为“新文化丛书”出版,此书即是达尔文奠定生物进化理论基础的重要著作《物种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译书一出,多次重版,风行全国,1932年印行第10版,至1936年已发行12版,足见读者范围非常广泛。必须指出,马氏的译书是以文言体翻译的,后来随着时代发展的需要又有新译本问世也就不足为奇了。另外,马君武预想的“四五十种”此类译著,在他的译本问世之后得以实现,而且进化论方面的译书超出了这一数字,这也是时代发展使然。

此后,马君武于1936年翻译出版达尔文的《人类原始及类择》(*The Descent of Man and Selection in Relation to Sex*),上海商务印书馆将其收入“万有文库”第1集,并注明为“汉译世界名著”。全书9册,分三个部分,共21章,书前有导言。第一部分“人类原始”7章,第二部分“类择(又名雌雄淘汰)”11章,第三部分“关于人类之雌雄淘汰及结论”3章。译书也是以文言体译出,且译者在书前没有就翻译做任何说明。陈范予所译裘灵·赫胥黎(J. S. Huxley)的《达尔文》,于1940年由永安改进出版社作为“世界大思想家丛书”出版,其中收入马君武翻译的《人类原始及类择》和《物种原始》。

在达尔文进化论学说的翻译介绍方面,除科学家马君武的卓越贡献之外,尚有其他一些达尔文著作的译本在民国时期出版。曾留学于日本东京大学的四川人周建侯,归国后任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教授、系主任、院长二十余年。他于1937年翻译了达尔文的著作《人及动物之表情》(上、下)(*The Expression of the Emotions in Man and Animals*)。原著出版于1872年,是继《物种起源》(1859)和《人类起源》(1872)之后,从情绪表现方面进一步论证人类和动物心理有连续性的进化论观点的名著。译书也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列入“万有文库”第2集第348种,并注明为“自然科学小丛书”。书中提出了有用的联合、对立作用和神经系统的直接影响等三条原理,使心理学从19世纪研究意识发展到20世纪初研究智慧起源,进而到以研究行为为对象的机能主义心理学阶段,使西方心理学的思想主流进一步脱离哲学的束缚而成为生物科学,同时也使心理学走上生物学化的道路。译书还于1979年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

著名生物学家周建人也于20世纪40年代翻译了达尔文的名著《物种起源》,译书取名《种的起源》,由上海生活书店作为“世界学术名著译丛”出版于1947年。在上册的“译者序言”中,周氏首先指出:“八十多年前欧洲出版了两本大著作,一本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另一本就是达尔文的《种的起源》。”然后,译者简要阐述了达尔文著书的“起因”、“社会背景”、局限性及其历史地位。译书虽然仍以竖排的形式印刷,但所用的语言已不再是文言,而是白话。这里选取译书第四章“自然选择,即最适的生存”中的一段,并与马君武1902年所译《物竞篇——物竞与天择之关系》和1920年出版的《达尔文物种原始》中的选段相对照,以显示各自翻译语言上的差异。

用比喻的说法:自然选择是从全世界每日每时在寻求最微细的变异,

of History of Translation in China 中国翻译通史 现代部分·第三卷

把坏的除掉,把好的留下来,并且增加上去;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什么地方,只要有会,它静静地、不知不觉的在工作,使各种生物对于生活的有机与无机条件之关系改良。这等缓慢变化的进行,我们是看不出来的,除非时间留下时代所经过的记号,并且我们对于已长久过去的地质时代所知道的又如此不完全,我们单看出现存的生物形态与先前所生存的不同罢了。(《种的起源》第71页)

欲论物竞之理,不可不知物竞与天择相关之理。夫生物个体之有变异,乃自然之势也。生物类中疑似之形,实多物种也。有分种焉,有变种焉。英国之植物有疑似之形二三百类。好学深思者可由之明以变化图生存之理矣。夫阐明以变化图生存之理,固予作书之本旨。然欲明此理,不可不先知物种由自然生起之理也。一生物可依细缢化生之理,可变其构造之一部为他一部,且由一有机物变为他有机物,以适其生活乎。此理也,余既以啄木鸟及寄生物二者明之矣。观于最劣等之寄生虫,亦可明其理。最劣等寄生虫之体,亦常披兽类之羽毛,如潜于水中之甲虫然 Beetle。体有羽毛以适于飘然御水面之微风而行美哉。细缢化生中之理,于有机物之世界任一处、任一物,皆在此理之范围而莫之能外也。(《斯宾塞女权篇、达尔文物体篇合刻》,原文无标点,此处标点为引者所加)

就有机物之分布于地球外面言之,其起义使人感动之重大事实,为各区域内居住物之肖似与否,完全不能据以气候及其他物理状态以解释之。最近凡著作家之曾研究此事者,所得结论,莫不如是。仅以美洲为例,已足证此说之真确。除北极及北部温带之外,许多著作家皆谓新旧两世界为地理分布之一大根本区别。若吾侪旅行于广漠之美洲大陆,自彼邦中部至极南一端,则所遇状态,至极歧异,有湿地,有干燥沙漠,有高山,有草原,有沼泽,有湖,有大河,其热度各不相同。旧世界之气候或状态,殆无不能与新世界平行者,至少为同物种通常需要者,皆密接平行。在旧世界固可指出甚小之区域,较新世界之任何区域更热者。惟居住此等区域之动物,与其周围地方之居住者,实无差别。(《达尔文物种原始》第461页)

由以上所引出两段译文可以看出,任何一个时期的翻译一般都受到时代语言规范的制约,新文化运动之前的翻译多用文言,而其后的翻译则多用白话。当然,这一区分并非截然的,过渡时期必然会出现两者兼而有之或文白杂糅的现象。下一节的诸多进化论译书所使用的语言也为此提供了佐证。另外,周氏的译文虽用白话,但与现代的语言相比仍有显见的不同之处。现代的读者一定会感到其语言生涩拗口,故此,新中国成立后又有该书的重译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除上述达尔文科学进化论名著的翻译出版之外,此时期尚有多种达尔文传记的翻译问世。《民国时期总书目》中录载了5种此类译著,罗列于下:

《达尔文传及其学说》,(德)海尔博(Adolf Heilborn)著,李季译,上海亚东图书馆1933年9月初版,1939年3月再版(列“知识之路丛书·达尔文评传”,内分少年时代、一个博物学家的旅行、其人及其事业、达尔文主义的回顾与展望等部分,卷首有译者长序,书名原文 *Wege zum Wissen Darwin, sein Leben und seine Lehre*)。

《达尔文自传》,(英)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著,周韵铎译,上海世界书局1935年4月初版(卷首有达尔文的前记,自传原稿前有小题“我的精神和性格发展回忆”,书名原文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Charles Darwin, including An Autobiographical Chapter*)。

《达尔文传》,(英)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著,全巨荪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9月初版(“万有文库第2集,自然科学小丛书”,正文前有达尔文的儿子法兰西斯·达尔文一段关于其父传记的简要说明,书末附《我父亲日常生活的回顾》和《查理士·达尔文的宗教信仰》,书名原文 *Autobiography of Charles Darwin with Two Appendices*)。

《达尔文》,裘灵·赫胥黎(J. S. Huxley)著,陈范予译,永安改进出版社1940年6月初版(“世界大思想家丛书”,原书不分章节,译书8章的标题系译者所加,主要评述达尔文进化论思想,其中《物种原始》和《人类原始及类择》两部分为马君武所译,卷首有《达尔文小传》和译者弁言)。

《达尔文自传》,(英)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著,苏桥译,上海生活书店1947年6月初版,东北新华书店1948年出版。

其中全巨荪翻译的《达尔文传》于1939年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作为“万有文库第1、2集简编”出版,内容相同。需要指出的是,在所见著者冠名为“达尔文”的译著中,1937年商务印书馆编入“万有文库第2套第304册”的《优种学浅说》一书,并非进化论的创立者达尔文所著,而是其子 Major Leonard Darwin(1850—1943)的著作。译者是卢于道,译书还曾列入“自然科学小丛书”出版。全书17章,用白话文翻译。在“译者序”中,译者就书名的翻译解释道:“本书原名为 *What is Eugenics* 应译为‘何为优种学’,今为易明而适合书名起见,改译为‘优种学浅说’。又 *Eugenics* 一字,亦有译作优生学者,今以所优者在‘种’而并不在‘生’,故译为‘优种学’。好在后者亦是很通用的名字……”

至此,达尔文科学进化论才得到完整的翻译介绍,其进化论学说的系统理论最终与中国的读者见面,也在国内得到广泛的传播。不难看出,科学家马君武为此做出的贡献尤其突出。

二、其他进化论著作的翻译

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达尔文进化学说的翻译只是整个科学进化论著作翻译活动中的一小部分。此时期,大量有关进化论著作的翻译就像马君武所预言的那样如期而至。不仅翻译了为数不少的进化论专著,而且在所译的一些论文集和其他著作中也都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in China
中国翻译通史
现当代部分·第三卷

涉及了进化学说。

早在1916年,就有过耀根编译的《人类进化之研究》由上海商务印书馆纳入“新知识丛书”第6种出版,至1926年9月已出到第7版,影响非常广泛。译书后附录“生物与遗传”和“人种改造与遗传”。

马君武之后,合肥人刘文典在进化论翻译方面也做出的较大成绩。刘文典(1889—1958),字叔雅,原名文聪,笔名天明等。幼年入教会学校,不仅打下扎实的外语基础,而且接受了西方文化的熏陶,为后来从事进化论的翻译创造了条件。1907年,在当时的留日大潮之中他也东渡扶桑,求学于东京。1912年回国后,与同乡范鸿仙等在上海与于右任、宋教仁等办《民立报》,在报社从事翻译工作,《青年杂志》曾刊出他译述的英国赫胥黎所著《近世思想中之科学精神》、《美国人之自由精神》等,与此同时发表文章鼓吹革命。报社在“二次革命”失败后被查封,他只得亡命日本。1916年归国后被介绍到北大任教,前后达10年。1927年9月组成以刘文典为首的“安徽大学筹备委员会”,学校成立后刘任文法学院院长兼预科主任,主持安大工作。1928年底卸任后曾在西南联大(1937—1946)、云南大学等学校任教,建国后一直在云大教书终其余生。(戴健:《刘文典一生述评》,《安徽史学》,1991[1]:56—60)

刘文典的进化论翻译有其明确的目的性。当时,正当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之际,西方唯心主义哲学与神学糅合的“灵学”,英国灵学会会长劳奇(Oliver Lodge)的《死后之生存》通过高桥五郎的日文译书传入中国,泛滥于国内的知识界。1917年,经营上海中华书局的俞复、陆费逵等人成立上海灵学会,创办《灵学丛志》,1919年成立的北京悟善社还出版了《灵学要志》。一时间,披上科学外衣的神学迷信甚嚣尘上,参与活动的甚至有不少久负盛名的学者,如丁福保、陆费逵等,《天演论》的译者严复也位列其中。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一些学者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开始系统地翻译介绍并广泛地宣传进化论。刘文典1918年着手翻译德国进化论的捍卫者海克尔(Ernest Heinrich Haeckel, 1834—1919)的名著《生命之不可思议》,并在1919年译毕于北京香山。译书于1922年10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编入“共学社丛书·哲学丛书”出版,十分畅销,至1926年11月已出至第3版。全书分真理、生命、灵异、生命的科学、死、原形质、摩内拉、营养、生殖、运动、感觉、精神的生活、生命之起源、生命之进化、生命之价值、道德、二元论、一元论等18章。该书将生物区分为动物、植物和无核生物,认为最低级的生物是无核的原形质,由一些基本的化学元素组成。译著的第3章“灵异”曾发表于《新青年》1919年第6卷第2期,足见译者反击迷信思想的迫切。他在译书的序言中记述说,开始翻译此书时,“正当那《灵学杂志》初出版,许多‘白日见鬼’的人闹得乌烟瘴气的时候。我目睹那些人那个中风狂走的惨象,心里着实难受,就发愿要译几部通俗的科学书来救济他们,并且防止别人再去陷溺,至于我自己外国文的浅陋,科学知识的缺乏,译笔的拙劣,都顾不得了。经了几次的选择,就拣定了赫克尔博士的两部书,一部是《宇宙之谜》、一部就是这个《生命之不可思议》。”(刘文典译:《生命之不可思议》,转引自邹振环《关于刘文典生平的一点补充——谈谈刘文典的进化论译著》,《安徽史学》,1991[4]:62—63)刘文典对原著的选择经过再三审慎的考虑,译书的目的在这里也表述得非常清楚,即是要针对当时社会中出现的在学术研究的掩盖下的迷信活

动,运用科学进化论的知识使世人认清“灵学”的真实面目。译者在其后出版的《进化论讲话》的附录中,列出有关进化论方面的西文书籍20种,其中第19和第20种述及《宇宙之谜》以及该书与《生命之不可思议》之间的关系。他记述道:“赫克尔著的《宇宙之谜》……出版之后真是风行一时,名声非常之高,几乎是世界各国文都有译本。(译者注,中国文的译本,是马君武先生翻译的。)……赫克尔著的《生命之不可思议》,这部书的体裁、内容都和《宇宙之谜》差不多,简直可以认为是《宇宙之谜》的一个续篇。不过关于生物学的话却是这部书里多些。这部书现在几乎世界各国文都翻译过了的。(译者注,中国文的译本就是我译的,共学社出版。)”因此,译者虽选定了两部书,但自己只译出其中的一种,也许是后来因发现有马氏的译本而没有重译。

除赫克尔的进化论名著翻译外,刘文典还通过日文翻译了两部关于进化论的通俗著作,即《进化与人生》和《进化论讲话》,两书皆为“日本理学博士丘浅次郎”所著。前者由上海商务印书馆于1920年11月初版,编入“共学社丛书·时代丛书”,次年3月再版,至1931年3月出至第7版,是“共学社丛书”中版次最多的四部书之一;(邹振环:《张元济与共学社》,《档案与历史》,1986[4])后者由上海亚东书局于1927年11月初版,次年再版,1933年2月出至第3版,也是亚东书局发行量较大的图书之一。《进化与人生》分“脑髓之进化”、“生物学的看法”、“动物界里的‘善’与‘恶’”、“由生物学上看起来的教育”、“教育和迷信”、“被人误解了的生物学”、“所谓‘自然的美’和‘自然的爱’”、“动物的私有财产”、“所谓‘文明病’的根源”、“进化论和卫生”、“民种改善学的实际价值”、“人类之将来”等章,用畅达的语言清楚地阐述了精微的进化理论。其中的有些章节,显然是与反对迷信直接相关的。《进化论讲话》全书分20章,论述了进化论的内容和历史、生存竞争和自然淘汰、遗传和便宜、人类在自然界里的位置、进化论的生物学证据、达尔文以后的进化论,以及进化论对于思想界的影响等诸多方面,“教人读着无异于听一位老博士‘口若悬河’似的在那里讲演,只觉得畅快,不觉得烦难。一场听到底,不费事就把进化论的梗概都懂得了。”(刘文典译:《进化论讲话·译者序》,上海亚东书局,1933:2)另外,译者还就翻译该书的目的做出了细致的说明。他说:

我在十多年前认定了中国一切的祸乱都是那些旧而恶的思想在那里作祟。要把那些旧的恶的思想扫荡肃清,唯有灌输生物学上的知识到一般人的头脑里去。关于进化论的知识尤其要紧,因为一个人对于宇宙的进化,生物的进化没有相当的了解,决不能有正确的宇宙观,人生观,这个人也就决不能算社会上的一个有用的分子了。

因为这一个牢不可破的成见所驱策,我就译出了几部通俗的生物学书,如赫凯尔的《生命之不可思议》,丘浅次郎的《进化与人生》之类。后来我自己不长进,沉迷于那些破碎支离的校勘训诂,咬文嚼字的文选学,就把这件事搁下了。

去年秋天老友胡适之回来,特地写信规劝我,奖进我,说我不译书是社会的一个大损失。这才鼓动了我的兴致,重理起旧业来。其结果就是《进化与



of History of Translation in China
中国翻译通史
现代部分·第三卷

人生》出版七八年之后又有这部《进化论讲话》出版。(刘文典译:《进化论讲话·译者序》,上海亚东书局,1933:1—2)

刘文典译书为“用生物学知识打破旧恶思想”,这不仅得到胡适的鼓励,也得到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的大力支持。

刘文典在译书的序言中论到翻译的难处时,引用佛经翻译家鸠摩罗什的话说:“翻译好比嚼饭哺人,这句话真是不假啊!”他还就译名问题做了如下的说明:“他这部书因为要教人容易了解,极力的把那些生涩的名词避去不用,所以关于译名上也没有什么要声明的。不过书上所有的人名,地名和学名,都只有日本字母的拼音,我只好尽我所晓得的都注出英文的原名,这里面难保没有错误,还要请大家指教。”(刘文典译:《进化论讲话·译者序》,上海亚东书局,1933:2)比如元素镭译为“镭锭”,后注出英文radium。这一做法在现在的译书中仍然使用。译者在译序的最后用诗一般的语言歌颂科学给人类带来的无边福祉:“……这时候昭明太子庙一带十里的霜枫正红得火似的,山色湖光都格外的醉人,自然界正在‘尽态极妍’的逞他的美丽,恐怕就是赫凯尔所谓‘科学和诗歌合而为一’的时候吧。”(刘文典译:《进化论讲话·译者序》,上海亚东书局,1933:2)

刘文典翻译的进化论著作都使用白话,浅显易懂。下面从《进化论讲话》中选取的一段译文可以表明其翻译的语言特色。

世界上的许多人一听见了“进化论”这三个字,就都笼统统的不去细细思索,以为这是个主张“普通的猴子进步成为人类”的学说,唇焦舌敝的在那里极力辩驳;其实进化论决不是这样主张的啊!从前还有一位老先生在杂志上做过一篇论文,说菊花固然可以培养出无数样的变种来,但是无论怎样的变法,菊花到底还是菊花,决不会变成牡丹,变成莲麦的。由这上面看来,那呐喊得震天动地的所谓“进化论”实在是个不合事理的谬论罢了。这位老先生的议论和前面所讲的那班人的话是全然同样的错误。菊花虽然不能变成牡丹莲麦,也决不能就把这个算做进化论的反对证据啊。(《进化论讲话》4—5)

马君武除翻译达尔文的进化论科学著作外,也翻译了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的通俗讲演集《自然创造史》(Natürliche Schöpfungsgeschichte),提出著名的生物重演律,原著的序言后有歌德1780年撰写的《自然》(Die Natur)。译书共8册,30讲,分进化论、普通系统史两个部分,由上海商务印书馆于1935年列入“万有文库第2集”出版,1936年又作为“汉译世界名著”出版,马氏将著者名译为“赫克尔”,同样以文言体译出。此外,马君武还撰写有《达尔文》一书,系统地介绍达尔文的学说。毋庸置疑,达尔文科学进化论的系统翻译是由马君武完成的,尽管整个翻译过程因多种原由而延续了十几年时间。上文提及,刘文典在译书《进化论讲话》的附录中提到马君武翻译的另一部书,即海克尔凝聚毕生思想之精华撰写的著作《宇宙之谜》,原书出版于1899年,书中

提出一元论的唯物主义哲学体系。刘氏在译书附录中说道：“赫克尔著的《宇宙之谜》……是马君武先生翻译的。”（刘文典译：《进化论讲话》，亚东书局，1933）思想家严几澄在译著《进化论发见史》的序言尾注中也在列举6种译书时提到，赫克尔的《宇宙之谜》（*The Riddle of the Universe*）有马君武译本，改名《一元哲学》，中华书局出版；另有马译《达尔文物种原始》，也由中华书局出版，并认为这几种译书最适合于钻研。（严几澄译：《进化论发见史》，商务印书馆，1927）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将科学进化论翻译介绍到中国的名著翻译时代，马君武、刘文典的翻译活动卓尔不群，为进化论知识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的译书都是多次再版，读者范围非常广泛。在这一时期，尚有其他一些知名学者也从事过进化论的翻译活动。这里只介绍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几位。

较早翻译进化论的科学翻译家郑太朴（1901—1949），原名松堂，字贤宗，号太朴。幼习英文和中学课程，（郭洛：《郑太朴与商务印书馆》，《1897—1987 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262—272）1918年进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处任翻译，1919年秋在商务印书馆“取诸社会，用人惟才”的用人原则下进入编译所。1921年起自学德文并研究数学，同时从事翻译活动。所译罗素的《战时之正义》由商务印书馆编入“共学社丛书”出版于1921年。1920年秋罗素来中国讲学，见面后赞叹不已：“意想不到翻译我的作品的人竟这样年轻，中国青年人真了不起。”1922年，郑太朴赴德国留学，进哥廷根大学学习数学，并在学习期间翻译出版了 Von H. Weber 的《数学全书》。全书3册，第1册算术，第2册代数，第3册解析几何。1932年受聘于同济大学工学院任理科教授，1934年被聘为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特约编译。后曾在浙江省立医专、中山大学、交通大学、中华工商专科学校等校任教。1946年与郭沫若、茅盾、周建人等发起组织全国学术工作者协会，1949年初任商务印书馆总编辑。（林煌天主编：《中国翻译词典》，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939）郑太朴短暂的一生译著颇丰，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译作和著作达26种，不少多次再版。著译内容涉及哲学、数学、物理学、经济学、中外科技史等，尤其以数学方面为多。除上述的几种之外，还有《科学方法论》（“算学丛书”）、《科学与方法》（“汉译世界名著”，彭加勒著）、《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汉译世界名著”，牛顿著）、《数理方法论》（“算学丛书”）、《代数方程及函数概念》（“算学小丛书”）、《社会经济史》（“汉译世界名著”，Max Weber 著）、《工业原料与战争原料》（“社会科学丛书”）、《同温层之探险》等，所译著作皆由商务印书馆先后出版。有些译著在后文介绍，这里先介绍他所翻译的一部进化论著作。

在进化论著作翻译的大潮中，郑太朴也译出英国著名无神论思想家麦开柏（Joseph McCabe, 1867—1955）的著作《进化——从星云到人类》（*Evolution: From Nebula to Man*）。译书由商务印书馆编入“新时代丛书”于1922年12月初版，1924年10月3版，1927年1月已发行到第4版。全书通过“进化思想之进化”、“太阳及诸行星之诞生”、“地球之历史”、“植物之进化”、“动物之进化”、“人类之由来”、“人类之进化”、“将来观”等8章，论述宇宙及生物进化的经过。译者在译书的“例言”中将翻译的具体目的概括为“译科学书原以贩运智识”，“进化一语，传入中国亦已几十年，近来更通行口头禅；但对于此语能有明确之观念，十分清楚其意义者，恐还不多得。著述界中